

美国域外管辖权限制因素研究

——以第三和第四版《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为中心

郭玉军 王 岩*

摘要：在1987年第三版《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的基础上，美国法学会2018年出版了第四版。第四版延续了第三版将管辖权区分为立法管辖权、司法管辖权、执法管辖权的做法，并重述了相应的限制因素。第三版在对国际法重述的基础上，将合理性原则作为域外管辖权的核心限制因素。而第四版则是对国内法及司法实践发展的重述，将国际礼让作为域外管辖权的主要限制因素。从合理性原则转向国际礼让、从对国际法的重述转向对国内法的重述，体现了外交事务例外主义在美国的兴起和潜在的衰落，以及国际法在美国的地位浮沉。在域外管辖权问题上，中国应坚决反对美国轻视国际法的做法，坚持遵守国际法，将维护本国国家利益与促进国际社会和谐稳定相统一，对域外管辖权的行使进行必要的自我限制，警惕过度的域外管辖。域外立法管辖权的行使应不违反合理性原则，域外司法管辖权冲突的解决应坚持国际礼让原则，域外执法管辖权的行使应遵循国际合作原则。

关键词：对外关系法重述 域外管辖 合理性 国际礼让 法定解释原则

一 问题的缘起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美国滥施单边主义和“长臂管辖”，用法律作为经济战的武器打压中国。毫无限制地行使域外管辖权将不当侵犯他国主权，引发国际矛盾和冲突，特别是管辖权的重叠行使会导致司法混乱，浪费主张域外管辖权的国家的司法资源，对私人诉讼当事人造成不公平结果。^① 每个国家都有义务在对涉及外国因素的案件援引管辖权时保持适度和克制。管辖权限制是国际法律秩序的一个基石，对维护国际和平与遵行国际

* 郭玉军，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核心团队首席专家；王岩，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2019级国际私法专业博士研究生。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际私法视域下中国法域外适用的制度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ZD203）阶段性成果，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① See Cameron Hutchison & Moin A. Yahya, “Infringement & the International Reach of U. S. Patent Law”, (2008) *The Federal Circuit Bar Journal* 241, pp. 256 – 257; Cedric Ryngaert, *Jurisdic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nd edn, 2015), p. 220.

礼让至关重要。^①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深入研究美国域外管辖的限制因素，为构建公平合理的中国域外管辖权制度提供借鉴。

美国的域外管辖权制度独具特色和代表性，《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The Restatement of U. S. Foreign Relations Law，以下简称《重述》）是美国有关域外管辖权问题的重要文件。^②虽然《重述》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对美国法律的发展影响巨大，^③对美国法院实践的作用不可小觑。^④

2018年，美国法学会出版了《重述》第四版，与《重述》第三版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是在对管辖权的限制问题上。鉴于第一版与第二版距今时间较久，且前两版采取了将管辖权区分为规定管辖权（jurisdiction to prescribe）和执行管辖权（jurisdiction to enforce）的两分法，不同于后两版中的三分法，^⑤故而本文将聚焦于第三版与第四版中的域外管辖权限制因素，分析两版限制因素的异同，并探究发生此种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以期为中国域外管辖权制度构建提供借鉴。

二 对域外立法管辖权的限制因素

域外立法管辖权，系指制定能域外适用的法律的权力，^⑥主要涉及立法机构制定法规、行政部门制定命令或条例、法院通过判例形成普遍适用的普通法。^⑦《重述》第三版中对域外立法管辖权的限制因素以合理性为核心；第四版则是围绕国际礼让原则展开。

（一）第三版中的限制因素

1. 合理性

第三版第403节第1款规定，即便有第402节规定的管辖权依据，但若立法管辖权的行使不合理，便不能行使立法管辖权；第2款规定了合理性的判断因素。作为立法管辖权限制的合理性原则是国际法原则。行使管辖权的合理性可能因法律法规位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两个国家行使管辖权均合理但法规发生冲突时，应当通过利益衡量方式消除冲突。合理性原则作为限制原

^① See Donald I. Baker,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Why Friendly Foreign Democracies Oppose Novel, Expansive U. S. Jurisdiction Claims by Non-Resident Aliens Under the Alien Tort Statute”, (2013) 28 *Marylan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2, p. 50.

^② See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02, Reporters' Note 1 (2018).

^③ See Sarah H. Cleveland & Paul B. Stephan, “Introduction: The Roles of the Restatements in U. S. Foreign Relations Law”, in Paul B. Stephan & Sarah A. Cleveland (eds.), *The Restatement and Beyond: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U. S. Foreign Relations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1.

^④ See William S. Dodge, “Jurisdiction, State Immunity, and Judgments in the Restatement (Fourth) of US Foreign Relations Law”, (2020) 19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01, p. 103.

^⑤ 第三版和第四版对管辖权种类采取了三分法，第三版表述为 jurisdiction to prescribe、jurisdiction to adjudicate 和 jurisdiction to enforce，第四版表述为 prescription、adjudication 和 enforcement。为便于理解和论述，本文采取立法管辖权、司法管辖权和执法管辖权的表述方式。

^⑥ 参见〔美〕帕得罗·J.马丁内兹-弗拉加：《国际私法程序中礼让的新作用》，李庆明译，谢新胜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

^⑦ See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02, Comment a (2018).

则，既可以适用于民事管辖权，也可以适用于刑事管辖权。但在刑事管辖权问题中，只有在明确声明或清晰暗示的基础上，才能确定将国家领土以外的行为纳入美国刑法管辖之下的立法意图。在适用合理性原则时，对在他国实施的行为行使刑事管辖权可能被视为特别具有侵犯性。如果对跨国行为的规制是基于行为在规制国境内的效果，则合理性原则要求限制管辖权的行使，以尽量减少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行为发生地国的管辖权冲突。^① 基于第403节的合理性和避免冲突原则，第四章副章A规定了外国国家强制（foreign-state compulsion），并认为外国国家强制是国际法原则。若一国行使的立法管辖权不合理，因服从该国的命令而受诉的被告一般不可援引外国国家强制这一抗辩理由。^②

在第三版出版后，第403节在美国的适用毁誉参半。一方面，许多法院适用合理性原则，认为合理性原则是对国际实践有价值的重申。另一方面，合理性原则也受到指摘，批评者认为该节所宣称的习惯国际法地位缺乏足够支撑，或该节的形式过于开放和复杂，赋予法官过多自由裁量权，或认为合理性原则是对美国规制权力和利益的不适当限制。正是这三种批评意见的混合，导致了合理性原则的缓慢消亡。除去其假定的习惯国际法地位，该节似乎是可有可无和自由裁量的。它的多因素形式违背了法律形式主义和简单规则，特别是在保守派的推动下，法官难以在自由裁量权受限的情况下适用这些判断因素。对于寻求更积极地单方面适用美国法的激进人士而言，该节限制了域外管辖的可能性。因此，目前美国最高法院逐渐放弃适用合理性原则，而是越来越依赖推定无域外效力（presumption against extraterritoriality）限制联邦成文法的地域适用范围。^③

2. 利益衡量

第三版第403节第3款规定了利益衡量标准，即在两国之间的立法产生冲突时应通过衡量利益确定规制国。第3款适用于两国各自行使管辖权均合理，但其法规发生冲突的情况。此时，每个国家都需要评估其行使管辖权的利益和另一国的利益。在可能时，两国应进行协商。如果一国的利益明显更大，另一国应予退让，废止、解释或修改其法规，以消除冲突。当两国都没有明显更大的利益时，两国往往都会试图消除冲突，以减少国际摩擦，避免使法规的规制对象陷入困境。该款不适用于受规制对象可以同时遵守两国法律的情形。在权衡外国利益时，美国法院可以考虑外国政府对国家利益的表示，无论是通过外交照会、法庭之友意见书（brief amicus curiae），还是政府官员在议会辩论、新闻发布会或公报中的声明。相应地，在美国利益方面，法院可以考虑行政部门的官方声明或记录中对美国利益的宣示。例如，在私人反垄断诉讼中，法院可以考虑司法部的决定，即美国对某项交易或活动适用其反垄断法的利益不足以抵消其对美国对外关系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④

3. 法定解释原则

第三版第403节的评论指出，应当以避免不合理或冲突的方式解释美国法律。这一解释原则不仅适用于法院，也适用于行政部门官员和监管机构对在其立法权限内制定的法规的解释，总统在审议提交给他批准的法案时也可以依靠法定解释原则（principles of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若

^① 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03, Comments a-f & Reporters' Notes 3, 8 (1987).

^② 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41, Comment e (1987).

^③ See Hannah L. Buxbaum & Ralf Michaels, "Reasonableness as a Limitation on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U.S. Law: From 403 to 405 (via 404)", in Paul B. Stephan & Sarah A. Cleveland (eds.), *The Restatement and Beyond: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U.S. Foreign Relations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286–287.

^④ 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03, Comment e & Reporters' Note 6 (1987).

不太可能在国际法范围内对法规进行解释以适应国会的意图，则该法规虽仍有效，但其适用可能会引起美国的国际责任。^①“迷人的贝希推定”（Charming Betsy canon）^②等法定解释原则体现了对合理性原则的支持。^③由此可见，第三版的法定解释原则本质上也是遵循合理性原则。

（二）第四版中的限制因素

1. 国际礼让

第四版第 401 节认为，国际礼让反映了国际法未强制要求的对外国国家的尊重。第 402 节指出，在立法管辖权发生冲突时，美国法院通过运用基于国际礼让的解释原则限制与其他国家法律的冲突。在行使立法管辖权时，美国考量其他国家的合法主权利益，是立法礼让的表现。^④

第 407 节认为，在习惯国际法允许一国行使立法管辖权但该国采取限制措施以减少对他国管辖的干扰时，是一国出于国际礼让的考量。虽然国际法中没有对相互竞争的立法管辖权要求分配优先权的规则，但许多国家已经制定了处理实际或潜在管辖权重叠问题的国内法规则，以减少冲突的可能性。美国以国际礼让为由限制美国法律的地域适用范围的做法不是习惯国际法的要求，因为它并非依国际法律义务作出。^⑤

第四部分第四章讨论了外国行使立法管辖权对美国法院的影响，该章所规定的外国国家强制和国家行为原则（act of state doctrine）是立法礼让的体现。第 441 节规定了国家行为原则，该原则不是管辖权依据，而是在法院对案件有管辖权时的裁决规则。尽管该原则确实反映了国际礼让的考虑和对不适当干涉另一主权国家行为的关注，但却不是国际法所要求的。它以美国宪法规定的权力分立为根基，特别是以司法和行政部门之间的适当职能分配为基础。该原则未规定于宪法中，是在国会没有相反规定的情况下默认，构成联邦普通法，可被联邦成文法取代。^⑥第 442 节规定了外国国家强制。只有当两个或更多的国家对人员、财产或行为有重叠的合法立法管辖权要求，且当一个人不能同时遵守联邦和外国法律时，才会出现外国国家强制问题。^⑦

2. 宪法限制

第四版第 402 节第 1 款和第 403 节强调对宪法限制的遵守。第 402 节第 1 款要求美国行使立法管辖权的前提是遵守第 403 节规定的宪法限制。第 403 节的题目便为“联邦宪法限制”，规定联邦政府、任何州或其任何组成部分对立法管辖权的行使，不得超过宪法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根据联邦宪法，国会拥有立法权，并可授权行政部门进行立法，联邦法院也有一定的权力“制定”联邦普通法。宪法限制主要表现为正当程序条款。根据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联邦和州法的适用既不能是任意的，也不能造成根本的不公平。在第三版中并未规定联邦宪法限制，仅规定了对立法管辖权的国际法限制。^⑧

^① 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115, Comments a & b (1987).

^② 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114 (1987).

^③ 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03, Reporters' Note 2 (1987).

^④ F. Hoffmann-La Roche Ltd. v. Empagran S. A., 542 U. S. 155, 165 (2004).

^⑤ See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07, Comments b, e & Reporters' Note 4 (2018).

^⑥ See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41, Comments a, b & h (2018).

^⑦ See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42, Reporters' Note 1 (2018).

^⑧ See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03, Comments a, c & Reporters' Notes 1 – 7 (2018).

3. 法定解释原则

第四版第404—406节规定有法定解释的三个原则，即第404节的推定无域外效力、第405节的合理解释原则（reasonableness in interpretation）和第406节的符合国际法解释原则。

推定无域外效力作为对国会意图的推定，只适用于联邦法和诉因，不适用于授予联邦法院事项管辖权的条款。该推定不是对国会立法权的限制，可依据国会意图被推翻。^① 虽然如此，但该推定事实上能够限制法院的域外管辖权。^② 随着习惯国际法关于立法管辖权的地域性要求变弱，推定无域外效力从“迷人的贝希推定”中分离出来，并以不同的理由为适用依据，^③ 理由主要包括出于国际礼让原则的考量^④和主要关注国内情况的假设。^⑤

通常情况下，美国法院必须尊重行政机构对其经授权制定的法规的合理解释。^⑥ 《重述》第二版第38节规定了美国法的属地解释原则，而在第三版中却无相关规定，第四版第404节回归了第二版的规定，重述了推定无域外效力。^⑦ 适用推定无域外效力不排除美国法院根据特定条款的文本、历史和目的采取其他礼让限制。在将其他礼让限制与推定无域外效力相结合时，美国法院应注意不要重复考虑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但由此可能会使其他礼让限制成为不必要。^⑧ 推定无域外效力只是临时的解决方案，而非具有深远影响的强大原则。它是走向一致和广泛接受的法律选择原则道路上的中转站。^⑨

第405节规定了合理解释原则，该原则中体现的合理性是立法礼让问题，该原则是一项法定解释原则，而非拒绝适用联邦法律的自由裁量权，应与其他法定解释原则一起适用。在解释联邦成文法的地域适用范围时，美国法院力求避免不合理干涉其他国家的主权权力，体现了尊重其他国家的合法主权利益，有助于不同国家潜在冲突的法律的和谐。立法礼让并不寻求避免对其他国家主权权力的所有干涉，而是要避免对他国主权权力的不合理干涉。若适用联邦法律可以为美国的合法利益服务，则对外国主权权力的干涉就可能是合理的。^⑩

第406节规定了符合国际法解释原则。原则上美国法院试图将联邦成文法解释为不与涉及立法管辖权的国际法相冲突。但国会有权超越国际法的限制而制定联邦成文法，若联邦成文法确实与国际法不一致，则联邦法院必须执行国会的意图，而不管该成文法是否符

^① See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04, Reporters' Notes 1 & 7 (2018).

^② See William S. Dodge, "The New Presumption Against Extraterritoriality", (2020) 133 *Harvard Law Review* 1582, p. 1645.

^③ See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04, Comment a & Reporters' Note 2 (2018).

^④ *American Banana Co. v. United Fruit Co.*, 213 U. S. 347, 356 (1909); *E. E. O. C. v. Arabian American Oil Co.*, 499 U. S. 244, 248 (1991); *RJR Nabisco, Inc. v. European Community*, 136 S. Ct. 2090, 2100 (2016); *Kiobel v. Royal Dutch Petroleum Co.*, 569 U. S. 108, 115 (2013).

^⑤ *Foley Bros., Inc. v. Filardo*, 336 U. S. 281, 285 (1949); *RJR Nabisco, Inc. v. European Community*, 136 S. Ct. 2090, 2100 (2016); *Morrison v.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Ltd.*, 561 U. S. 247, 255 (2010).

^⑥ See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04, Reporters' Note 12 (2018).

^⑦ See *Restatement (Second)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38 (1965);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04, Reporters' Note 13 (2018).

^⑧ 法院在解释法规时发现的其他立法礼让限制没有采取单一的形式，而是因条款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会根据有争议的特定条款的文本、历史和目的采取不同的形式。See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05, Comments c & d, Reporters' Notes 4, 5 (2018).

^⑨ See George Rutherglen, "Territoriality and Its Troubles", in Paul B. Stephan & Sarah A. Cleveland (eds.), *The Restatement and Beyond: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U. S. Foreign Relations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379.

^⑩ See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05, Comments a & b (2018).

合国际法。^①当然，国会制定的与国际法不一致的联邦成文法可能会引起美国违反国际法义务的负面后果。^②

4. 真实联系

第四版第407节指出若存在真实联系，则习惯国际法允许行使立法管辖权。真实联系主要表现为国家与被规制对象之间的具体联系，如该行为发生在国家的领土上，或由其国民实施或针对其国民实施。^③

（三）两版限制因素的区别

两个版本中都用一节的形式规定了对立法管辖权的限制因素，但第三版更偏重于合理性原则的限制作用，并将合理性原则认定为是国际法事项；第四版则更偏重于立法礼让的限制作用，更强调国内法对本国立法管辖权行使的限制。

1. 对合理性原则的重视度不同

在第四版草案中，合理性原则被完全删去，而其正式文本中第405节保留了合理解释原则，这是主张完全废除合理性原则与主张对合理性原则仅进行更新即可的不同观点妥协的产物。在合理性原则问题上，与第三版第403节相比，第四版第405节虽然仍允许考虑合理性原则问题，但却大大降低了其重要性和功能。例如，第三版认为合理性原则是习惯国际法要求，而第四版则认为合理性原则仅仅来源于美国法院的司法实践；第三版要求法院评估立法管辖权行使的合理性，即便管辖权依据满足，但若该行使不合理，则该行使便不合法，第四版则无该强制性要求，且认为额外的合理性考量是立法礼让问题；第三版中明确具体地规定了合理性的标准，以防止在与他国有关的案件中不合理地行使管辖权，而第四版则只是在标题中使用了“合理性”一词，在条文中只是用“其他限制”的开放式表述提及了合理性原则，避免不合理地干涉其他国家的主权权力的想法则体现在评论中；对于联邦成文法的地域适用范围，第三版要求逐案分析，而第四版则以逐条分析替代了逐案分析，合理性原则成为法定解释原则而非法院拒绝适用联邦法的自由裁量权；^④第三版中列举了合理性分析的判断因素，而第四版无论是在条文中、评论中还是报告人说明中均无相关内容。^⑤

2. 国际礼让发挥的作用不同

国际礼让在两版中发挥的作用不同，主要原因在于对国际礼让和国际法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同。^⑥第三版更强调对习惯国际法的重述，试图表明源于礼让的规则已经发展成为习惯国际法，但却被批评为没有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的支持。第四版在重述习惯国际法规则方面采取了更为克制的做法，并相应地接受了国际礼让，将国际法要求的对管辖权的限制与仅由国内法要求的对管辖权的限制加以区分。除此之外，第三版管辖权部分的报告人安德烈亚斯·罗文菲尔德

^① *United States v. Yousef*, 327 F.3d 56, 93 (2d Cir. 2003).

^② See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06, Comments a & b (2018).

^③ See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07, Comment c & Reporters' Note 2 (2018).

^④ See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05, Comment a (2018).

^⑤ See Hannah L. Buxbaum & Ralf Michaels, “Reasonableness as a Limitation on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U. S. Law: From 403 to 405 (via 404)”, pp. 283 – 290.

^⑥ 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 101, Comment e (1987).

(Andreas Lowenfeld) 将礼让视为法律义务的对立面也是礼让在第三版中发挥的作用有限的原因。罗文菲尔德解释说，避免使用“礼让”一词是因为礼让带有太多的自由裁量权甚至政治判断的色彩，与以法律义务为核心的合理性原则背道而驰。^① 对此，第四版管辖权部分的报告人威廉·道奇(William Dodge)认为，礼让并不是自由裁量权的同义词，虽非国际法律义务，但反映了国内法律义务，是国内有拘束力的规则的基础。^②

3. 对法定解释原则的态度不同

出现于《重述》第二版第38节的推定无域外效力在第三版中被删去，但在第四版第404节中重焕生机。原因在于，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法对推定无域外效力愈发重视。^③ 与第三版的逐案分析合理性方法相比，第四版确定联邦成文法地域适用范围的法定解释原则赋予法官较少的自由裁量权。^④ 因为联邦成文法的地域适用范围和判断标准一经确定，则美国法院不再有逐案分析的自由裁量权。此外，虽然有观点认为合理性原则与推定无域外效力本质上并无不同，但实质上两者的功能不同。推定无域外效力基于国内考量，^⑤ 其核心目的是确定联邦成文法的地域适用范围，而减少与他国的冲突只是其适用的副产品；合理性原则的核心目的则是减轻与他国的冲突，是优先性条款。^⑥

4. 对立法管辖权的限制程度不同

第三版认为在不符合合理性原则时，不应对相关事项进行立法，然而第四版却认为对于立法内容并无国际法限制，在发生冲突时可运用国际礼让、法定解释等方式减少冲突。由此可见，第三版对立法管辖权的行使设置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除上述不同外，第三版和第四版在合理性原则与国际礼让的关系、国际法事项与国内法事项的认定等方面也存在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合理性和国际礼让是同义词，有的学者则认为合理性属于国际礼让的下位概念，^⑦ 还有的学者认为合理管辖是否构成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存在争议。^⑧ 也正是因为两版重述对国内法事项与国际法事项的认定不同，第三版将外国国家强制认定为国际法要求，而第四版则认为其是各国为维护礼让而采取的国内法做法。^⑨

^① See Andreas F. Lowenfeld, “Antitrust, Interest Analysis, and the New Conflict of Laws”, (1982) 95 *Harvard Law Review* 1976, p. 1984; Andreas F. Lowenfeld, “Conflict, Balancing of Interests, and the Exercise of Jurisdiction to Prescribe: Reflections on the Insurance Antitrust Case”, (1995) 89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2, p. 52, footnote 50.

^② See William S. Dodge, “International Comity in the Fourth Restatement”, in Paul B. Stephan & Sarah A. Cleveland (eds.), *The Restatement and Beyond: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U. S. Foreign Relations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320, 323.

^③ See William S. Dodge, “The New Presumption Against Extraterritoriality”, (2020) 133 *Harvard Law Review* 1582, p. 1582.

^④ See William S. Dodge, “International Comity in the Fourth Restatement”, p. 326.

^⑤ See William S. Dodge, “Understanding the Presumption Against Extraterritoriality”, (1998) 16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85, p. 113.

^⑥ See Hannah L. Buxbaum & Ralf Michaels, “Reasonableness as a Limitation on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U. S. Law: From 403 to 405 (via 404)”, pp. 296 – 297.

^⑦ See Mistale Taylor, “Reasonableness in Its Reasoning: How the European Union Can Mitigate Problematic Extraterritoriality on A De-Territorialised Internet”, (2019) 62 *Ques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35, p. 39.

^⑧ See Dan E. Stigall, “International Law and Limitations on the Exercise of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in U. S. Domestic Law”, (2012) 35 *Hasting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 323, pp. 337 – 338.

^⑨ See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42, Reporters’ Note 10 (2018).

三 对域外司法管辖权的限制因素

域外司法管辖权是指通过一国法院对位于域外的人或物适用法律的管辖权。^① 对于除国家豁免外，国际法是否对域外司法管辖权施加了其他限制，《重述》第四版较之第三版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一) 第三版中的限制因素

1. 合理性

第三版第 421 节规定，行使司法管辖权的前提是管辖权的行使具有合理性，并列举了合理性的考量因素。限制立法管辖权的行使和限制司法管辖权的行使的合理性原则的标准不同。在特定情况下行使司法管辖权是合理的，但并不意味着法院地国对诉讼标的物有立法管辖权。相反，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可能有立法管辖权，但却没有司法管辖权，或虽有司法管辖权但司法管辖权的行使会引起争议。该节第 2 款列举的考量因素是相互独立的，每一个因素都足以证明司法管辖权行使的合理性。该节的评论指出，接触管辖权（tag jurisdiction）不为国际法所接受，不能作为司法管辖权行使的合理性依据。换言之，要求被告在法院地的存在不是暂时性的，若此为管辖权行使的唯一依据，则基于向仅在一国临时存在（transitory presence）的人送达而行使的管辖权在国际法上不再被接受。^②

2. 政治问题原则

政治问题原则（political question doctrine）与美国法院在美国对外关系法中的作用紧密相关。^③ 美国法院认为一些问题特别是外交事务构成政治问题，应当尊重行政部门的声明或立场，不可由法院审理。^④

3. 国家行为原则

第三版第四章副章 B 涉及的国家行为原则，是美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为指导自身而发展形成的对外关系法中的原则。作为一项自我约束的司法限制原则，其基本上是为了避免对外国的不尊重，反映了对行政部门的尊重，类似于政治问题原则。^⑤ 如果总统在某一特定案件中确定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益需要适用国家行为原则，此时总统的决定对法院具有约束力。^⑥

4. 国家管辖豁免原则

对外国国家的管辖豁免规定在第三版第四部分第五章中。国家行为原则和国家管辖豁免原则都是基于尊重国家主权独立和平等的考虑，以及对一国国内法院审判另一国活动的权力的限制。国家管辖豁免原则主要针对的是法院的管辖权；国家行为原则针对的是法院对所提出的特定问题的可允许的审查范围。^⑦

^① See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Part IV, Chapter 2, Introductory Note (2018).

^② 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21, Comments a, c, e & Reporters' Note 5 (1987).

^③ 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1, Reporters' Note 4 (1987).

^④ See Louis Henkin, "Is There a 'Political Question' Doctrine?", (1976) 85 Yale Law Journal 597, pp. 597–625.

^⑤ 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1, Reporters' Note 4; Part IV, Introductory Note (1987).

^⑥ 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44, Comment f (1987).

^⑦ 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43, Reporters' Note 11 (1987).

(二) 第四版中的限制因素

1. 正当程序

第四版第422节第2款规定，宪法的正当程序条款要求法院的管辖权行使应与案件有充分联系且合理。在国际鞋业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对被告行使对人管辖权不得违反“公平竞争和实质正义的传统观念”。^①后来的判例将这一要求定性为合理性要求，并归纳了合理性要求的几个因素。一般管辖权和特殊管辖权都要遵守正当程序条款的合理性要求。然而，由于一般管辖权所要求的接触往往满足这些要求，合理性通常只在特殊管辖权案件中作为对对人管辖权的独立制约。^②在将合理性要求适用于国际环境时，美国法院指出，应当着重考虑在外国法律体系中为自己辩护的人所承受的负担。关于国家利益，法院则应考虑其利益受到主张管辖权影响的其他国家的程序性和实质性政策。^③

2. 国际礼让

第四版国际礼让体现在不方便法院原则、禁诉令制度和域外取证的注意事项中。

第424节规定了不方便法院原则，该原则是美国最高法院批准驳回案件以支持外国法院管辖的唯一原则，被认为构成国际礼让问题，是对域外司法管辖权行使的重要限制。^④该原则被报告人作为法律原则（doctrine of law）适用，而非司法自由裁量权。第四版全面审查了不方便法院原则，试图为经常被视为纯粹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原则找出规则。尽管如此，第四版对该原则的描述并不完整，未能更准确地描述美国联邦法院在适用该原则时应遵循的因素和理由，特别是对在被告住所地即为诉讼地的情况下为何仍要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缺乏讨论。^⑤

第425节规定了禁诉令。根据国际礼让原则，对于禁诉令的发出应保持高度谨慎和克制，只有在最令人信服的情况下，美国法院才有发布禁诉令的自由裁量权。^⑥

第426节规定了民事程序中的取证问题。美国法院被赋予了决定证据出示命令的范围和规模的自由裁量权，当证据位于国外时，法院应根据比例原则和国际礼让行使自由裁量权。比例原则和国际礼让可以对证据披露与开示进行限制。^⑦

3. 国家管辖豁免原则

第四版的国家管辖豁免原则也规定在第四部分第五章。^⑧第四版认为，除了各种形式的豁免权的重要例外，现代习惯国际法一般不对司法管辖权施加限制，^⑨对司法管辖权的过分主张将作为礼让问题受到限制。^⑩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没有显示出对豁免权领域以外的司法管辖权的限制。^⑪

^① *International Shoe Co. v. State of Wash.*, *Office of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and Placement*, 326 U. S. 310, 316 (1945).

^② See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22, Comment d & Reporters' Note 7 (2018).

^③ See *Asahi Metal Industry Co., Ltd. v. Superior Court of California, Solano County*, 480 U. S. 102, 113–115 (1987).

^④ See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24, Reporters' Notes 9 & 11 (2018).

^⑤ See Donald Earl Childress III, “Forum Non Conveniens in the Fourth Restatement”, in Paul B. Stephan & Sarah A. Cleveland (eds.), *The Restatement and Beyond: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U. S. Foreign Relations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359, 369.

^⑥ See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25, Reporters' Note 3 (2018).

^⑦ See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26, Reporters' Note 2 (2018).

^⑧ See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Part IV, Chapter 5 (2018).

^⑨ See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Part IV, Chapter 2, Introductory Note (2018).

^⑩ See William S. Dodge & Scott Dodson, “Personal Jurisdiction and Aliens”, (2018) 116 *Michigan Law Review* 1205, p. 1234.

^⑪ See William S. Dodge, “International Comity in the Fourth Restatement”, p. 327.

(三) 两版限制因素的区别

第三版与第四版都认为国家豁免是国际法对司法管辖权的限制要求，但第三版认为除此之外，合理性原则也是国际法要求，而第四版则认为除国家豁免外国际法未对一国司法管辖权的行使赋加任何限制。

1. 国际法对司法管辖权的限制要求不同

第三版认为司法管辖权一般被视为属于习惯国际法的范畴。^①但第四版认为，除了各种形式的豁免权的重要例外，现代习惯国际法一般不对司法管辖权施加限制。^②然而，国际法为一国管辖权的行使提供了平台和设置了外在边界，要求国家与被规制对象之间存在联系或连结，该观点久已有之，直至今日仍发挥重要作用，且《重述》第二版和第三版中也都坚持该观点。^③此外，第三版第421节认为，对司法管辖权中对人管辖权的要求来源于国际公法还是国内法这一问题并不清楚，而第四版则认为对人管辖权的要求来自于美国内外法。^④

第四版认为国际法未对司法管辖权施加限制的观点饱受争议，与传统观点大相径庭，第四版的立场基于两种非正统的国际法路径，难以得到承认和证实。对于第四版所持的国际法未对一国司法管辖权施以限制的观点，可能会使美国人在外国更易被诉，因为第四版表明，如果没有自我施加的国内法限制，在与美国被告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外国法院可以在各种民事案件中对美国公民合法地行使管辖权。^⑤

2. 对接触管辖权的充分性认定不同

第三版中认为接触管辖权因不被国际法所接受而不能成为司法管辖权行使的合理性依据；但第四版在对美国判例法进行梳理后认为，满足接触管辖权可以对自然人建立对人管辖权，但对企业高管的送达对于建立起对企业的一般性对人管辖权而言是不充分的。^⑥

3. 对国家行为原则的性质认定不同

第四版中认为国家行为原则和外国国家强制原则均属于立法礼让，而第三版则认为外国国家强制原则是对立法管辖权的限制，国家行为原则是对司法管辖权的限制。

四 对域外执法管辖权的限制因素

域外执法管辖权是指一国通过法院或非司法手段在域外执行其法律，并强制规制对象遵守其

^① 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Part IV, Chapter 2, Introductory Note (1987).

^② See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Part IV, Chapter 2, Introductory Note (2018).

^③ See Austen Parrish, “Adjudicatory Jurisdiction and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The Fourth Restatement’s New Approach”, in Paul B. Stephan & Sarah A. Cleveland (eds.), *The Restatement and Beyond: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U. S. Foreign Relations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305 – 308.

^④ See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22, Reporters’ Note 11 (2018).

^⑤ See Austen Parrish, “Adjudicatory Jurisdiction and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The Fourth Restatement’s New Approach”, pp. 304, 314.

^⑥ See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22, Reporters’ Note 5 (2018).

法律的权力。^①无论是《重述》第三版抑或是第四版，都对域外执法管辖权施加了严苛的限制，将他国同意作为其行使的前提条件，并要求执法主体行事不得超出国内法规定的权限范围。

(一) 第三版中的限制因素

域外执法管辖权的行使应当受法律的约束。司法执法(judicial enforcement)的限制在各国家大体相同，无论案件为纯国内案件抑或涉外案件，所受限制也并无不同；但非司法执法(nonjudicial enforcement)的限制则主要受国内法约束。^②

1. 对国际法的遵循

根据国际法，执法管辖权的行使必须符合合理性的要求。^③第三版第431节规定，任何强制执法管辖权的行使都要遵守合理性原则，制裁必须与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相称。这体现了比例原则在执法管辖权中的重要限制作用。该节阐述了合理性原则的一个推论，即无论是通过法院还是其他方式采取的执法措施，都必须与被规制的活动或行为以及被指控的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有合理的关系。对蓄意和系统性的违法行为而不是对可能不知道自己违反执法国法律的孤立行为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具有合理性。非司法执法管辖权的行使只有在非任意的情况下才符合国际法。根据国际法，一国不得在其没有立法管辖权和司法管辖权时行使权力执行其法律。这种主张管辖权的行为，无论是通过司法手段还是通过非司法手段进行，都可能遭到直接受影响的人和其他相关国家的反对。有立法管辖权的国家如果也有司法管辖权，则可以通过法院执行其法律，但不能对某人有效行使司法管辖权的事实并不排除该国通过非司法手段执行其法律。对与外国的贸易实施禁运不在第431节范围内，但作为对违反法律或法规的制裁而将个人列入出口黑名单属于该节所涉及的执法管辖权的主张。^④

2. 国内法限制

域外执法管辖权的行使要受宪法限制。第431节认为，即使根据国际法，一国可以在其边界之外行使执法管辖权，其法院或执法机关也不得超越其在国内法下的权力。第433节指出，如果美国官员主要参与了在国外进行的搜查和扣押，他们的行动可归于美国，并受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约束。第721节规定，美国官员的作为和不作为，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国外实施，都要受到美国宪法的约束。

3. 同意

第431节第2款g项规定，一国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要求在其境内经商的人同意接受与该活动有关的执法管辖权。例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在美国发行证券的外国非政府发行人授权其在美国的代表签署注册声明，并授权其在美国的代理人接收停止令等强制措施的通知。^⑤对于外国政府发行人来说，也应确保对管辖权的明确同意。^⑥第432节和第433节是对刑法执行措施的

^① 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Part IV, Chapter 3, Introductory Note (1987);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Part IV, Chapter 3, Introductory Note (2018).

^② 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31, Reporters' Note 1 (1987).

^③ 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Part IV, Chapter 3, Introductory Note (1987).

^④ 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31, Comments a, c, e, f (1987).

^⑤ 17 C. F. R. § 230.262.

^⑥ 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31, Reporters' Note 6 (1987).

重述。第 432 节第 2 款规定，一国的执法人员只有在他国同意时，才能在该国境内执法。作为国家主权的必然结果，一国官员未经他国同意，不得在后者的领土上行使其职能。因此，虽然一国可以对他国的人采取某些非司法执法措施，但执法人员不能在他国实施逮捕措施，并且只有在该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在该国进行刑事调查。若一国未经同意在他国行使执法管辖权，则在其境内发生这种活动的国家通常抗议此种执法管辖权的行使违反了国际法。第 433 节第 1 款 a 项规定，在获得他国同意且经美国正式授权后，美国的执法人员可行使域外执法管辖权。

（二）第四版中的限制因素

1. 他国的同意

第四版第 431 节第 2 款规定，美国要在他国领土上行使强制执法管辖权，必须取得该国的同意。执法管辖权有严格的地域性。^① 第 432 节第 2 款规定，该要求是习惯国际法的要求。违反关于强制执法管辖权的习惯国际法会引起国际责任。^② 美国无权在没有该国同意或默许的情况下在他国执行其法律。^③

2. 宪法限制

第四版第 431 节第 3 款规定，美国行使强制执法管辖权，必须遵守宪法。在美国境内行使强制执法管辖权，完全受制于宪法的规定；当在美国领土之外行使强制执法管辖权时，某些宪法条款可能不适用，或以不同方式适用。^④ 在确定特定宪法条款在美国领土之外的适用性时，联邦最高法院着眼于该条款的司法执法是否不切实际和反常（impracticable and anomalous）。^⑤

（三）两版限制因素的区别

国内法和国际法均对域外执法管辖权施加了限制。在国内法限制方面，两版均提及了宪法的限制；在国际法限制方面，第三版强调合理性原则的限制和刑事执法中他国的同意，第四版则强调他国同意这一习惯国际法规则。虽然两版均将同意作为行使域外执法管辖权的前提条件，但第三版区分了刑事执法与民事执法，前者的同意的作出者是国家，后者的同意作出者是从事商业活动的私主体。第四版则未作此种区分，^⑥ 仅提及他国的同意。

五 两版重述的变化特点、原因及评价

较之《重述》第三版，无论是对域外立法、司法还是执法管辖权，《重述》第四版中的限制因素都进行了较大调整，主要表现为从合理性原则转向国际礼让、从对国际法的重述转向对国内法的重述，其根源在于外交事务例外主义在美国的地位下降。此种转变在美国学界引起了较大争鸣。

^① *Fed. Trade Comm'n v. Compagnie De Saint-Gobain-Pont-A-Mousson*, 636 F.2d 1300, 1316 (D. C. Cir. 1980).

^② See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Part IV, Chapter 3, Introductory Note (2018).

^③ *United States v. Blanco*, 861 F.2d 773, 779 (2d Cir. 1988).

^④ See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31, Comment c & Reporters' Note 8 (2018).

^⑤ *Boumediene v. Bush*, 553 U.S. 723, 760 (2008).

^⑥ See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32, Reporters' Note 9 (2018).

(一) 变化特点

纵观第三版与第四版的限制因素，合理性原则与国际礼让分别贯穿始终。这是因为，第三版集中于对国际法特别是习惯国际法的重述，而第四版认为，若无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的支撑，不能将某一规则认定为习惯国际法的要求，因此第四版着眼于对美国内法的重述。^①因合理性被认为是习惯国际法的要求，国际礼让是国内法事项，故而限制因素体现为从合理性到国际礼让的转变。

国际礼让在第四版中的突出地位反映了第四版在重述国际法规则时的谨慎态度，以及对重述美国内法规则的相应强调。第四版的报告人依靠国际礼让的概念区分国际法不要求的规则和要求的规则。报告人认为，第四版对对外关系法领域的贡献之一是通过承认其许多原则建立在国际礼让而非国际法的基础上，更具灵活性。^②

《重述》的适用对象主要是美国法院，在对美国法院的管辖权行使限制中，对域外执法管辖权的限制最为严苛，两版均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都要求对域外执法管辖权加以限制；对域外立法管辖权的限制方面，第三版强调合理性原则这一国际法原则的限制作用，第四版则在强调国际礼让这一国内法事项的限制作用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注意到合理性原则的限制作用；在对域外司法管辖权的限制方面，第三版强调外交事务的特殊性，并注重国际法的限制作用，而第四版则是认为国际法未施加限制，强调宪法等国内法的限制作用。统而视之，两版对域外立法和司法管辖权的限制力度均弱于对域外执法管辖权的限制，而第三版的限制力度整体高于第四版。

(二) 变化原因：价值目标的转变

两版的立场转变，实际上体现了外交事务例外主义（foreign affairs exceptionalism）在美国的兴起和潜在的衰落。外交事务例外主义是指外交关系中产生的法律问题在功能上、理论上、方法上都与国内政策中产生的问题不同的观点。^③第三版包含了二战后产生的冷战世界主义（Cold War cosmopolitanism）的观点，该观点反映了对美国外交政策孤立主义传统的拒绝，旨在使美国在外交事务中发挥更广泛的作用，意在实现美国所谓“自由世界的领导者”（global leader of the free world）的野心，通过确定习惯国际法原则并将这些原则纳入美国内法，发挥美国作为开明国际舆论领袖（leader of enlightened international opinion）的作用。然而，第三版中反映的以例外主义为主导的外交关系制度的愿望并没有实现，第四版则代表了例外主义法学与联邦法院对有关外交关系的国家政策采取更加宽容的姿态之间的过渡，是对外关系法学过渡状态的中转站。^④

^① See William S. Dodge, “International Comity in the Fourth Restatement”, pp. 320, 325.

^② See William S. Dodge, “International Comity in the Fourth Restatement”, pp. 328 – 329, 334.

^③ See Ganesh Sitaraman & Ingrid Wuerth, “The Normalization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2015) 128 *Harvard Law Review* 1897, p. 1900.

^④ See G. Edward White, “From the Third to the Fourth Restatement of Foreign Relations: The Rise and Potential Fall of Foreign Affairs Exceptionalism”, in Paul B. Stephan & Sarah A. Cleveland (eds.), *The Restatement and Beyond: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U. S. Foreign Relations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37 – 64.

此外，重述对国际法有无对司法管辖权施加限制的讨论，部分是在讨论国际法的渊源。^① 第四版关于国际法未对司法管辖权施加限制的观点，实际上是将国家权力的司法行使完全移出法律领域转而进入政治领域，表现出将政治置于法律之上的态度。^②

（三）对重述立场转变的评价

对第四版的立场转变，美国学界的支声与反对声分庭抗礼。

支持的学者认为，第四版将限制因素认定为国际礼让问题而非国际法要求，由此国家可以依据其需要对限制因素的适用进行塑造，^③ 表明这些限制因素是法院用来解决跨国案件问题的工具包的一部分。没有哪种因素能在每个案件中都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但司法礼让或立法礼让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就能提供足够的工具解决出现的大多数问题，为法院处理规制冲突提供多种选择。有时，问题在于最好的工具是立法礼让还是司法礼让。^④

反对意见则认为，第四版揭示了对习惯国际法和法律演变的相当激进的看法，试图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处理习惯国际法，以此来回避长期存在的既定法律原则，并将对国家主权的关键限制从国际法的范围内剔除，可能是“利用所谓的习惯放弃法律”的首次尝试。^⑤

在立法管辖权方面，第四版对合理性原则的轻视的理由并不具有说服力。当然，第四版的报告人所依据的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案（Hartford Fire）^⑥ 和安帕格安公司案（Empagran）^⑦ 中，法官更多依赖推定无域外效力而非合理性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完全放弃了合理性原则，而是因为法院在逻辑上通常在先考量推定无域外效力，若法院经分析后认为联邦成文法不适宜域外适用，则法院便不会再行考量合理性原则的其他限制问题。故而第四版所认为的合理性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已不再被适用的观点站不住脚。合理性限制根本不意味着法院必须尊重外国规制利益，即使这些利益在抽象上比美国的利益更重要。它所要求的只是在具体案件中考虑到这些外国利益。对第三版合理性原则的担忧之一是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⑧ 导致三权分立原则难以得到遵循，且破坏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然而，联邦成文法的地域适用范围应当由国会而非法院决定，虽因国会的语焉不详不可避免地使法院通过法定解释原则确定联邦成文法的地域适用范围，但法院的权力行使并非任意的，同时，推定无域外效力也并不具有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因此，仅保留推定无域外效力而废弃合理性原则不可取。第四版将合理性作为法定解释的事项，将实际上

^① See Pamela K. Bookman, “Toward the Fifth Restatement of U. S. Foreign Relations Law: The Future of Adjudicative Jurisdiction under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in Paul B. Stephan & Sarah A. Cleveland (eds.), *The Restatement and Beyond: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U. S. Foreign Relations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353.

^② See Austen Parrish, “Adjudicatory Jurisdiction and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The Fourth Restatement’s New Approach”, pp. 315 – 316.

^③ See William S. Dodge, “International Comit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Curtis A. Bradley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Foreign Relations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706 – 708.

^④ See William S. Dodge, “International Comity in the Fourth Restatement”, pp. 332 – 333.

^⑤ See Austen Parrish, “Adjudicatory Jurisdiction and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The Fourth Restatement’s New Approach”, p. 316.

^⑥ *Hartford Fire Ins. Co. v. California*, 509 U. S. 764 (1993).

^⑦ *F. Hoffman-La Roche Ltd. v. Empagran S. A.*, 542 U. S. 155 (2004).

^⑧ See William S. Dodge, “Reasonableness in the 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2019) 55 *Willamette Law Review* 521, pp. 535 – 537.

是司法任务的内容归于国会及其假想的意图。因此，推定无域外效力和合理性限制之间的功能差异被掩盖，导致合理性原则成为了推定无域外效力的附件而非发挥限制作用的单独工具。^①

在司法管辖权方面，第四版采取该观点是因为很少有国家实践或法律确信的公开证据可以肯定地证明国际公法对司法管辖权有和对立法管辖权的限制一样的限制的存在，也几乎没有证据证明国家可以在与争端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行使管辖权。对此，既可解释为根本不存在国际法限制，也可解释为显示了对国际法限制的接受和绝对遵守。第四版的立场不仅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如不干涉、主权平等和自决等原则）相矛盾，而且似乎旨在部分消除国际公法在限制国家干预其他国家事务的权力方面的作用。^②此外，这一观点可能会影响美国国内对司法管辖权的国际法限制的态度。未来的扩张型司法管辖权可能引发来自美国之外的国家、当事人和法院的反对意见。当然，应当注意到，近年来，美国最高法院不再追求“司法霸权主义”（judicial imperialism），而是转向了“诉讼孤立主义”（litigation isolationism），^③限制涉及外国当事人或外国行为的案件进入美国法院。因此，第四版认为国际法对司法管辖权无限制的观点或许并不会导致美国法院滥用域外司法管辖权。^④

六 对中国的启示

目前，中国一些立法中已有法律域外适用的规定。但是，一方面中国尚未制定对外关系法，处理“对外—内部事务”治理变迁的法律框架有待发展形成。^⑤另一方面，外国也有观点认为，尽管中国抨击美国借“长臂管辖”滥施霸凌行径，但中国法院有朝一日也有可能作出更多的“域外判决”。^⑥由此可见，外国有对中国法院滥用域外管辖权的担忧、误解甚至诬蔑的观点。因此，明确域外管辖权行使的限制因素，警惕过度的域外管辖十分重要。

首先，在立法中需要明确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⑦不同部门之间应当实现合理的权力分配；明确国际法对域外管辖权行使的限制因素，遵循国际法，反对美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第四版所认为的国际法未对域外司法管辖权施加任何限制的理解；应以负责任大国的态度与外部世界建立起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国家利益的主张应合理合法、自我约束，绝不索求无度，尽力使国家利益的实现与国际准则的维护协调统一。^⑧具体而言，在行使立法管辖权时，可以借鉴第三版中的合理性原则，遵守合理性原则的要求。

^① See Hannah L. Buxbaum & Ralf Michaels, “Reasonableness as a Limitation on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U. S. Law: From 403 to 405 (via 404)”, pp. 291 – 302.

^② See Austen Parrish, “Adjudicatory Jurisdiction and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The Fourth Restatement’s New Approach”, pp. 316 – 317.

^③ See Pamela K. Bookman, “Litigation Isolationism”, (2015) 67 *Stanford Law Review* 1081, pp. 1103 – 1104.

^④ See Pamela K. Bookman, “Toward the Fifth Restatement of U. S. Foreign Relations Law: The Future of Adjudicative Jurisdiction under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pp. 335 – 341.

^⑤ 参见蔡从燕：《中国崛起、对外关系法与法院的功能再造》，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130—131页。

^⑥ “A Belt-and-Road Court Dreams of Rivalling the West’s Tribunals”, *The Economist*, <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2019/06/06/a-belt-and-road-court-dreams-of-rivalling-the-wests-tribunals> (last visited 29 September 2021).

^⑦ 参见蔡从燕：《中国崛起、对外关系法与法院的功能再造》，第139—142页。

^⑧ 参见王逸舟：《中国为什么特别需要尊重国际法》，载《世界知识》2015年第21期，第58—61页。

其次，对域外司法管辖权划定合理边界，塑造中国法院在世界舞台上的良好形象，明确法院在中国对外关系法行使中的作用，有力回击来自外国的诬蔑。在对与中国有关联的事项进行立法后，若中国法与外国法发生冲突，中国司法机关在行使域外司法管辖权时，可以借鉴第四版中的国际礼让等方法，进行域外管辖的自我限制与协调；在法律地域适用范围模糊时，发挥司法解释的能动作用，借鉴第三版特别是第四版中的法定解释原则，有限度地进行域外管辖。^①

最后，执法机关在行使域外执法管辖权时应坚持对国际法的遵守，以获得他国同意为前提，遵循中国一贯秉持的国际合作原则，在国内法特别是宪法划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事。

A Study on the Limits to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parison of the Restatements (Third & Fourth)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Law

Guo Yujun and Wang Yan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Restatement (Third)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Law (1987),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published the Fourth Restatement in 2018. The Fourth Restatement continues the Third Restatement's distinction of jurisdiction into prescriptive, adjudicative, and enforcement jurisdictions, and restates the corresponding limit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restat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the Third Restatement treated the reasonableness as the main limit to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On the contrast, the Fourth Restatement is based on the restatement of the domestic law and judicial practi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ity becomes the core limit to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of this edition. From reasonableness to international comity, from the restate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the one of domestic law, the huge change shows the rise and potential fall of foreign affairs exceptionalism, and the different import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it comes to China, on the issue of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China should resolutely oppose the contempt for international law li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sist on the respect for the international law. Besides, China should unify the pursuit of its national interests with the maintenance of 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 and stability, carry out self-restraint of the exercise of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and guard against the exorbitant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The exercise of extraterritorial prescriptive jurisdiction should not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reasonableness, the resolution of extraterritorial adjudicative jurisdictional conflicts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comity, and the exercise of extraterritorial enforcement jurisdiction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Keywords: Restatement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Law,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Reasonableness, International Comity, Principles of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责任编辑：李庆明)

^① 参见李庆明：《论美国域外管辖：概念、实践及中国因应》，载《国际法研究》2019年第3期，第21页。